



终生难忘“清华人”这个称号

○郭维敬（1949 外文）

1946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千里迢迢辗转来到北平，专程参加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考。经过缜密思考，我毅然选择了清华。之后，“清华人”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便牢牢嵌在心中，终生难忘！

清华熏风

每当想起在清华度过的那段峥嵘岁月，我都不免有一种莫可名状的豪情。首先忆起的是梅贻琦先生主政清华时，重大师的办学理念，无为而治的治校方针。当时学校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人才济济，大师荟萃，怎不引

青年学子神往？

入学之初，听知名人类学家兼教务长吴泽霖教授为我们讲“清华精神与传统”时，第一次听到“清华人”这个具有震撼力的称号，从此，赋予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如影随形，泽及终生。朱自清先生讲现代文学，他那深邃平静的一代名师风格、视野，与他那拒吃美国救济粮的学人风骨，令人高山仰止！李广田先生讲授散文娓娓道来，如绵绵细雨，字字珠玑，使人如饮醇醪。吴晗先生快人快语，抨击时政一针见血。汤佩松先生讲如何学科学，说话不疾不徐，深入浅出，常杂以传神妙喻，助人理解，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孙毓棠先生讲授历史口若悬河，对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作比较时，旁征博引，言之有据，极具说服力。罗念生先生精通希腊文学，他讲授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时，形象生动，声情并茂。维纳斯、阿波罗等诸神及希腊古代英雄，无不栩栩如生，引人入胜。马约翰先生讲运动时能用十分流畅的英语一贯到底，平素精神矍铄，严冬盛夏时刻为人表率，令人钦羡。张奚若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在动员我们参军南下完成全国解放任务时，热情高涨，讲话中形象地直指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是



1949年3月，郭维敬（前排左2）与清华大学外文系同班同学摄于二校门前

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帜的“包饭团”，声色俱厉，至今言犹在耳！在他的鼓舞下，清华学子迅速掀起参加“南下工作团”的高潮，师生竟有 240 余人投笔从戎，这在清华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光辉一页。

南下征途

1949 年 3 月 11 日，在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里，清华各年级 240 余名同学在全校师生热烈欢送中，精神抖擞地进入北平城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其中还有外文系知名教授盛澄华夫妇及各系几名青年教师。顾名思义，南下工作团就是要越过长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各项战斗任务，这是多么动人心弦的时代使命，这任务又是多么神圣！

肩负南下重任，最首要的是思想武装，因此，我们经过了一系列学习。直接聆听了多位中央领导的报告，其中包括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真、叶剑英、聂荣臻、谢觉哉、罗荣桓、陶铸、李立三，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如郭沫若、邓初民、刘白羽、艾青等。周恩来的讲题是《目前形势和任务》；朱德则为《动员南下》，他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功则归人，过则归己”。这些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既鼓舞斗志，又激动人心。毛泽东也不例外，在百忙中给我们的赠言是“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天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南下工作团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 41 军，在湖南的东安县正式进入部队担任随军记者，随尖刀连追击。当时的口号是“速度就是胜利！”因此我们每日要行军百里以上，每到驻地我还要抓紧写战地新闻报道。就这样星夜疾驰，一步步走过

湖南与广西的山山水水，到达西江沿岸的梧州、桂平一带。部队的任务这时由追歼国民党残部转为清剿散处四乡的匪霸，建立革命政权，并向新区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当时我随 461 团驻军桂平，桂平紧依西江，古称浔州，上达贵县、南宁，下接与广东毗邻的梧州市，自古地理位置重要，太平天国起义的金田村就在其境内。部队在桂平、平南等相邻县境的乡间清剿匪霸，机关则在城区军管，进行接收与宣传工作，任务紧迫艰巨。

恰在这期间，在十万大山围歼国民党残部的战役胜利结束，大批重要战俘经由桂平向北押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白崇禧的第三兵团司令兼第七军军长李本一。李本一是新桂系的一员有名战将，他指挥的第 7 军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王牌军，在广西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现在第 7 军被全歼。这一消息传开后，既可震慑当地一切反动势力，又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为此，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李本一进行了采访。

李本一从外表上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风度的高级将领，虽然被俘但还从容沉稳。从文化上看也有一定素养，对军事上被彻底战败沦为俘虏颇为感慨。他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日本人打过多次硬战，没有料到仍然兵败被中共俘虏。他对自己将会遭到什么命运，感到焦虑茫然，显出郁闷神情。我针对他的思想状况对他讲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军心、民心是决定因素，并进而指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和士气的高低。我还向他宣讲了共产党对俘虏的政策，被俘将领只要思想转变，向人民靠拢，

□ 我与清华

还是有前途的。李本一听了这段实事求是，不施加任何压力，又平等待人、合情合理的谈话后，在无可奈何的叹息中对我说：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采访后，我抓紧时间写了一篇《李本一访问记》，以当时唯一的宣传方式，用墙报在桂平主要大街公布，墙报周围长时间挤满围观的人群。

在桂平3个多月的军管工作后，我调回设于梧州的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从事部队教育工作约一年时间。

抗美援朝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1950年11月间，由于志愿军急需英语翻译，我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总政从全国各部队抽调外语干部，我自任抽调之列。师里接到调令后，师政委曹传赞同志亲自跟我谈话，鼓励我服从组织入朝作战。于是我办理手续后迅即只身北上，向总政报到



1953年8月，敌我双方联合红十字会上组部分人员在我接收区我方牌楼前合影，当时郭维敬（右5）任中方中组翻译组长

后经东北军区由安东（现丹东）渡江出国。北上途中，我曾萌生取道山西与年逾七旬的父亲见上一面后再报到的念头，但想到战争需人紧迫，因此还是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东北军区（现沈阳军区）招待所中，曾听到由朝鲜回国的同志谈美机日夜封锁交通线，投掷凝固汽油弹的疯狂情况及朝鲜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国内战争。尽管如此，我丝毫没有动摇，还是急速赶赴安东，过鸭绿江后又星夜兼程赶往位于朝鲜桧仓里的志愿军总部报到，接受战斗任务。

从此，我在朝鲜度过近6年的悠长岁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朝鲜停战谈判板门店志愿军代表团及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三个单位工作。最早在俘管处任干事期间，我曾深入美、英等多国战俘军官及士兵各中队，进行深入的工作，写过一份被俘管处主任王央公认为很重要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剖析早期我军对俘教育管理工作的成败得失及各国战俘的思想动态，指出各国俘虏中当时仍存在着三种基本情况，即对我军依然采取“敌对、恐惧、怀疑”的态度，如继续按照教育管理国内战俘的老作法，收效甚微，很难转变俘虏的思想。

这篇报告不仅为

这篇报告不仅为

俘管处，而且也为中央军委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意见。不久总政敌工部部长黄远亲到俘管处传达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俘管十六字工作方针，即“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从此俘管处明确了方向，工作立竿见影，改变了被动局面，取得巨大成绩。以后我被提升到四团任教育股长，主管全团千余名有士官军衔的多国战俘的教育工作。

在板门店谈判开始后不久，我又被调到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任一个大组的翻译组长，从此实际参与了多项停战前后的工作，持续时间近两年。我时而穿军装，时而穿便装，以不同身份，代表国家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美方及多国不同身份的代表们周旋，均胜利完成了任务。俘管处给我的鉴定是“训俘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代表团给我的鉴定是“对敌斗争能把握原则”。我思想上很满意，认为组织上对我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954年初代表团善后工作告竣，我与代表团所有翻译同样将集中回国到外交部重新分配工作，但这时原任观察代表团团长的张梓桢将军请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执意将我一人留下，调我到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任助理员。这显而易见是我一生的一个分水岭，我从此便失去了去外交部工作的机缘。

无愧此生

1956年春部队大批转业，我由朝鲜回国转业到河南，弹指间已过去57个春秋。回溯我自清华读书至今也已64个春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对此，我用58个字写了一首涂鸦《回眸》的小诗：



2011年6月，郭维敬（左）与老伴、外孙女在家中

风华正茂时，书生意气，豪情满怀。
抗美援朝中，效命祖国，风云一时。
卸甲归来时，风浪滚滚，惨遭磨难。
白发暮年期，壮志不已，日夜兼程。

前两行的历程前文已有交代，后两行明显表明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个阶段中，由于阶级斗争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在将近22年的岁月中，我个人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风浪滚滚中恪守心中的理想，接受磨砺。后一个阶段，由于国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从沮丧中复苏，又心情舒畅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尽管已近夕阳晚照的暮年期。为了弥补白白损失的时间，我在清华校训的支撑下，自策自励日夜兼程，一直走到望九之年的今天，仍在耕耘。

1956年转业，主管平舆县及信阳地区教育工作，努力贯彻周总理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消除知识分子的疑虑使们能大胆工作，取得明显成绩。1958年，河南极左思潮泛滥，我响应中央号召“下乡上山”，到确山县劳动锻炼，因坚持原则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被“偷偷”打成所谓“漏网右派”。由于上级不知情，致

□ 我与清华

后来“一吹风”平反时也被错过，一直蒙冤当“右派”劳改，致身心遭到无法想象的磨难，特别在“信阳事件”时，更是险象环生。1962年“摘帽”后，又在以后的“四清”、“文革”中受到牵连，无一日安宁。

改革开放之后，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我发扬“清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离休后，我做了以下几件事，以报效国家，奋斗至今。

一、用清华校友会名义办民办大学7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批青年学生。

二、先后为希望工程、汶川大地震捐款各3000元，2009年中央统战部为我落实政策时，又为单位办学捐20余万元。

三、挥笔著述写出了《世界第一等战俘营》（副题：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板门店谈判见证录》；《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九十年人生回望》等书，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其中《世界第一等战俘营》宣传人道主义宽待俘虏政策，于2010年又重新修订出版，为国家填补了一项重要历史资料空白。

四、1998年赴美，继续研究朝鲜战争近一年，挖掘出美著名战史专家贝文·亚历山大所著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购回译出，译名为《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连印7次之多，李德生上将写序，与第一本书同为祖国赢得世界声誉，这两本书在国内及美、英等多国图书馆皆有收藏。

五、访美归来，按几位在京的志愿军老上级与战友建议，将访美研究朝鲜战争的成果，向中央领导写了一份重要报告，概要摘录如下：

由1953年朝鲜停战迄今，美军政名人、专业作者、战史研究人员所撰各类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可谓浩如烟海，一本截至2010年的《朝鲜战争目录学》竟著录达2600余种之多！图书馆此类藏书汗牛充栋，且至今尚仍不断有新著问世。

反观我国，情况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1989年前，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竟完全付之阙如，不见一本。之后，始有洪学智、杜平等将军拓荒破冰，但后继者寥寥，与美国相比几乎“千不及一”！这与我国实际在战争中取胜，且在战争中作为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的历史地位，均极不相称。

我国自古素以历史典籍宏富著称于世，为什么却偏偏因对彭德怀元帅一度的不公正错误处理，而竟对这样一次为全民族赢得历史上空前巨大荣誉的国际性大战争，如此冷漠！真令人不能不感慨万端！难道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多国进行战争取得胜利，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从此登上世界强国的地位不是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不是我中华民族的一项永远可引为自豪的空前历史荣誉？

早年在清华寻梦的过程，尽管时间短暂，但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受用不尽。“清华人”和“清华校训”无论在我的南征途中，异国战地，或是在我转业河南的一路风雨泥泞中，以及晚霞夕照时的日夜兼程中，无不是我的精神支撑、思想动力源泉。

今后，我仍要永远用“清华人”自策自励，恪守己志，以求真正做到无愧此生。

2013年8月30日于郑州寓所